Globethics Repository



中國現代詩歌中的自我意識與聖經話語——以穆旦詩為個案研究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u, Yan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11-10 16:12:4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86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自我意识与圣经话语

——以穆旦诗为个案研究

刘　燕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基督教神学与现代性视角出发，以"九叶派"著名诗人穆旦的诗歌为个案，具体分析其诗歌中呈现的自我意识、主体身份、圣经话语及信仰诉求，展示圣经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回应现代文明引发的人性危机与生存困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写作视角。穆旦的写作困境和人生悲剧也引发了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反思，"灵性写作"与"灵性文学"可为当下文学的病症提供某种诊治良方。

关键词：圣经；现代性；自我意识；灵性文学

The Self Conscious & Bible Discourse in Chinese Modern Poetry

——A Case Study of Mudan's Poems

LIU Yan

Abstract: The article mainly studies self conscious, the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Bible discourse and faith seeking in Mudan's poetr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nd Christian theology. Mudan's modern poems provide a special solution in understand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reaction to the crises of human being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Mudan's writing dilemma and tragic life also lead us to rethink the crises of morals and faiths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Spiritual writing" and "spiritual literature" may provide a good way of resolving these literature diseases in our time.

Key words: The Bible; modernity; self conscious; spiritual writing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和合本圣经及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广泛流传,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信仰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逐渐传播并渗透到各阶层,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更广泛的中西文化背景下思考人性与自我,反思人类文明、现代战争与生存困境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新视角。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陈梦家、冰心、庐隐、许地山、沈从文、老舍等作家的一些作品开始从圣经中借用相关的文学模式、主题思想、叙述结构与象征意象,新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弥漫着有关人的原罪、堕落、分裂、挣扎以及与此相关的赎罪、宽恕、悔改、皈依、圣爱等源自基督教的文学结构、生命意识与神学话语。在20世纪40年代九叶派(中国新诗派)的作家群中,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1977)是最具基督教精神的现代诗人,其诗歌呈现了大量圣经话语并体现了强烈的信仰诉求,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回应现代文明引发的人性危机与生存困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写作视角,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提升到了几乎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同步的水准。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一、信仰危机与文学的现代性表达

信仰是人类生存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基石。无论信者所信的对象是上帝、命运、自然、乌托邦，或者是金钱、权利、自我，甚至作为哲学概念的虚无，信仰作为生存行为，具有生存本体论的结构。而知识分子的信仰必然通过其实践行动或文本呈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在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世界。因为信仰往往会通过文学家与艺术家们的言说，表现其所生存时代的生活行为、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灵。

"现代性"标示着人类社会—文化从农业结构向工业化、进而技术—信息化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形态以及意识观念的改变。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形成，是现代化社会转型的结果，其活动构成了文化言说的公共空间。现代性所标志的社会文化事件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深刻而巨大的转型。①自19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它体现为从中世纪基督教的主导话语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世俗化进程。"上帝之死"这一现代性论题无法从基督教中剥离出来，它本身就是基督教内部发生的一个事件。

一些当代历史学家用"大灾难"、"危机时代"或"极端时代"之类术语来描述20世纪的生存困境，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无助的时期。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几乎摧毁了人类有关正义、自由、民主、科学、真理的神话。置身于这样一个骚动不安、痛苦无助、混乱无序的时代，人类如同树枝离开了大地和树根，如同鱼离开了生命的源泉，从存在之根源上与上帝彻底地分离了。这种人与

① 刘小枫：《现代性语境与汉语知识分子》，见《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香港：卓越书楼，1993年，第155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上帝(存在)之间的疏离造成的罪恶感、孤独感和绝望感在20世纪尤为突出,并成为许多作家亲身遭遇并力图挖掘的写作资源。他们深深地置根于基督教土壤之中,或者以决绝、否定的方式展现上帝缺场、信仰崩溃、传统价值解体之后人的荒诞处境,如《恶之花》(波德莱尔)、《城堡》(卡夫卡)、《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等待戈多》(贝克特);或者以寻觅、肯定、皈依的姿态承受灾难、驱逐罪恶、呼唤神爱,如《荒原》(艾略特)、《杜伊诺哀歌》(里尔克)、《喧哗与骚动》(福克纳)、《我的安东尼娅》(威拉·凯瑟)、《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等。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对20世纪基督教信仰危机的处境做出了回应与探索。

与此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不断逼近下,中国被纳入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19世纪以来,随着新教传教士的来华以及圣经中译本的不断出版,自清朝以来中断了几百年的基督教信仰重新在华夏土地上发芽生根,中西文化开始了全面的接触、影响和交流。以1822—1919年间的汉译圣经为例,译本达到近30种。1822年、1823年最早出现了《马殊曼译本》和马礼逊的《神天圣书》;1837—1840年间出现了多部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汉等人合作翻译或修订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1904年、1906年出现了《浅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深文理和合新约圣经》;此后1919年的《文理和合本》、《国语和合本》等被社会各阶层广泛阅读,圣经成为许多作家案头必备的经典书籍。[①]汉译圣经对于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推动白话运动以及卷入现代化潮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现代文学亦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35年,年仅18岁的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和许多爱好诗歌的青年学子一样,他"首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派

① 据统计,时至新文化运动期间,官话和合本圣经在中国每年发行上百万册,仅1915年就发行了2900500册。参见罗章龙:《非宗教论》,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19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诗人”。[①]他模仿雪莱、拜伦式柔美、纤细的抒情风格，喜欢运用风、云、天空、鸟、树、花朵、青草等美丽、纯净的自然意象，抒发着对生命、流光、青春的无限慨叹。1937年10月穆旦作为护校队成员随清华南迁，就读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外文系，受教于叶公超、卞之琳、吴宓等名师，选修了燕卜荪开设的“当代英诗”，开始系统地接触英美现代派诗歌和文论。对这群青春勃发、渴求新知的大学生而言，一个出现在中国校园中的英国现代诗人本身就具有任何书本所不能代替的影响。尽管当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但是这些联大的年轻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即艾略特）和奥登。也许西方会出惊地感到它对于东方文化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②]在这一群不知疲倦的年轻诗人中就有穆旦，他大量阅读叶芝、艾略特、狄兰·托马斯和奥登等的现代主义诗歌，也开始尝试着运用挖掘、浓缩、凝聚、组合等现代派技巧描写战争与骚动年代的中国现实感与现代心理对痛苦的体验。

现代的分裂撕裂了浪漫的理想，血腥的时代屠杀了天真的幻想。现代文学风格的转换并非仅仅是某种形式上的求新，而是源自人性的分裂引起的文学内在的危机。在一个残酷的黑暗的历史时代，诗何以言？如果诗人依然用浪漫华丽的梦来粉饰现实，他（她）无异于说谎者和伪善者。那些先知般的诗人们总是走在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摸索新的可能出路，用全新的语言和艺术风格表达人类内心无法言说的痛楚和时代的创伤。在一个信仰匮

① 周钰良：《穆旦的诗和译诗》，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②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见《穆旦诗集：1939—194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乏、灵魂贫瘠的时代，人的极度无助与无边痛苦、生活的无意义与无目标，从否定角度愈加显明了现代人对信仰的祈求和对神性的渴望。以波德莱尔、卡夫卡、乔伊斯、艾略特、加缪等为代表的向内转的讽刺性、暴露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揭示了人远离上帝之后的困境。与这些西方现代作家们类似，穆旦诗歌的主题是前所未有地丰富而广泛，包括青春的欲望、爱情的困惑、残酷的战争、暴力、贫困、饥饿、通货膨胀、罪恶、流亡、孤独等，是对破碎的现代自我、绝望的灵魂、荒诞文明、瘫痪世界的讽刺性和否定性的表达，如《我》(1940)、《不幸的人们》(1940)、《我向自己说》(1941)、《诗八首》(1942)、《诗》(1943)、《忆》(1945)、《森林之魅》(1945)、《饥饿的中国》(1947)等。同时，在一个绝望挣扎的骚动时代，穆旦诗歌也弥散着对基督教信仰的强烈诉求和生命皈依的苦苦探寻，如《祈神二章》(1943)、《隐现》(1947)、《我向自己说》(1941)、《神魔之争》(1941)等。其诗风不再是柔美纤细、单纯幻想的浪漫抒情，而是更为硬朗、凝练、坚实，乃至复杂、晦涩的现代体悟。其诗中的现代自我则是各种复杂感情煎煮的产物，既有个人敏感的气质、迷惑的心灵和丰富的痛苦，也有现实社会的残酷、焦灼、挣扎、矛盾等。穆旦晚年总结自己的诗歌时说："总的说来，我写的东西自己觉得不够诗意，即传统的诗意很少。有时觉得抽象而枯燥；有时又觉得这正是我所要的，要排除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给诗以 hard and clear front（严肃而清晰的形象感觉）。"[①]然而正是这种硬朗、冷峻、清晰、新颖的现代诗风为中国新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现代主义品质。正如唐祈评价的："他那抽象观念与官能感觉相互渗透，思想和形象密切结合的抒情方式，新颖大胆的构思和锋利奇句的语言，确实比中国任何新

① 穆旦：《致杜运燮六封》，见《穆旦诗文集》(2)，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诗人更为现代化。"[①]穆旦比同时代诗人的超常之处在于,他能够对来自各方面的痛楚有着高度的自觉性,并把这一切融入知性的思考,使个人的激情、现世的关怀与永恒的思虑在现代汉诗中第一次得到全面表达。

二、主体的分裂:从浪漫自我到现代自我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思潮的催促下产生的,在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等诗人笔下,其自我形象要么是追求自我独立、个性自由与解放的抗争者,要么是寻求理想、呼唤爱情、伸张正义的寻梦者,这个"自我"从沉睡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中苏醒过来,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是充满生命活力和自由意志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个自我是一个有机的、和谐的统一体,或许也有彷徨、痛苦或忧郁,但最终这个坚强的"自我"总是在某种"理想"、"个性"、"爱情"、"自然"或无意识的"梦想"中找到最终的归属。然而,相比之下,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自我"开始了一个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时代。如穆旦的《我》(1940)呈现了现代"自我"触目惊心的分裂状态: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① 唐祈:《现代杰出的诗人穆旦——纪念诗人逝世十周年》,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诗中这个从母亲子宫中被割裂的自我，从出生之后就离开了温暖的母体，开始了孤独的流浪和漫长的荒野之途。自我与母亲的断裂意味着人与神的关系的疏远，也意味着人与原初完整状态（伊甸园）的分离。如果说浪漫自我在镜中呈现的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主体形象，那么，穆旦笔下的“我”则孤独地站在打碎了的镜子面前，注视着支离残缺、碎片化的模糊影像，这一半再也找不到另一半。即便是作为人与人之间最密切最信任的爱情关系，在穆旦那里，也不再像徐志摩爱情诗所描写的，是一种理想的关联所在，而是充满着怀疑与困惑。如《诗八首》（1942）：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
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
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我与你的相遇相爱只是无限时流中的偶然，是暂时的亲密，这个“我”随时处于变化之中把握不住自己，更把握不住所爱者，因为无情的时间、残酷的命运在变更着一切我们自以为稳定或永恒的东西，恋人们在爱情中的甜美与欢乐变成了上帝玩弄自己的游戏。穆旦发现普通的“自我”甚至是一个危险而可怕的存在：“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1941)穆旦对人性的怀疑与绝望来自传统文明的崩溃、既定信仰的失落、人与神的疏离、存在的荒诞感，来自对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流血、暴力、谎言、悖逆与欺诈等各种罪性的揭示：

在人类两手合抱的图案里，
那永不移动的反复残杀，理想的
诞生的死亡，和双重人性：时间从两端流下来
带着今天的你：同样双绝，受伤，扭曲！

——《诗四首》(1948)

显然，穆旦诗歌中的“我”不再是浪漫意义上的唯“我”独尊，而是不断分裂、衍生的多重自我，表现出对自我毫不留情的怀疑、讽刺与拷问，“我”也是“我们”、“你”或一切“他者”，具有变幻不定、流动不居的特性。“这样的分裂和怀疑，这样的绝望和仇恨，在穆旦之前的中国新诗中罕有所见；这是现代的‘我’，在空间和时间中失却了中心，不相信任何虚幻的希望，永远承受着矛盾，永远苦苦地寻找。”[①]这种否定性的反讽的现代文学表达方式意味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想主义的破灭、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神话的幻

① 孙玉石主编：《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灭，以及“上帝之死”后的信仰困惑。

与基督教作家艾略特一样，穆旦站在一个神学或玄学的高度，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矛盾分裂、漂泊无助的自我并非是现时的困境或由社会环境引起，而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不幸处境，是亚当夏娃背离神带来的原罪(Sin)的结果。如《不幸的人们》：“是谁安排荒诞到让我们讽笑，/笑过了千年，千年中更大的不幸。”分裂矛盾的自我深陷但丁笔下的地狱或炼狱中，经历了种种折磨、审讯与拷问，伤痕累累。飘游的灵魂在尝试了爱情、自然、理想与自由等种种寻求后，走到了穷途末日，在永恒维度的参照下暴露出一切现存物的暂时维度。这种关于“自我”的分裂性、变幻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乃是穆旦诗歌与中国20—30年代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分道扬镳之处，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和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更持续的深入影响。这种现代人的孤独感与疏离感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的苍凉感不同，儒家或道家的孤独可以在自然中得到解脱，纵身大化，天人合一，逍遥自在。而现代人的孤独源自人与上帝隔绝、人神分离之后的异化感与荒诞感。基督教认为，人仅仅靠自己无法得到救赎，灵魂痛苦的挣扎和无助的呐喊指向了那个人之外的最高存在者——上帝。当代学者刘小枫认为所谓“文学是人学”中这个“人”乃是“每一个孤独的受苦的肉身存在。文学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渴望在场的肉身在者的忧心和关怀。它在属于个体的肉身存在的言说中救护无故不幸者和犯罪的不幸者成为人”。[①]而穆旦诗歌的创造性在于，他“把肉体的感觉和玄学的思考结合起来”，[②]把“现实、象征与玄学”综合

① 刘小枫：“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的景观转换”，见《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香港：卓越书楼，1993年，第107页。

② 王佐良：“论穆旦的诗”，见李方编《穆旦诗全集》，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一体,[①]从一个由上而下的神性视角,言说了他所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的个体肉身如何经受着分裂的剥离与生死的挣扎,并指向那条唯一的拯救之路——生命的重生与信仰的皈依,虽然在走向天路的历程中充满着痛苦的挣扎和无尽的质疑。

三、救赎之路:从自我分裂到自我皈依

现代主义诗歌对破碎、分裂或隐遁的"自我"的非个性化的表现,并不意味着这个现代"自我"完全没有个性或不需要个性,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个性化"欲求,或者说是从多重的、变化的视角对"自我"及其个性的一种曲折幽深的表达。在穆旦们看来,力求现代自我的"破镜重圆"是可能的,只是其拯救力量不再是浪漫主义的自恋或自救,而是站立在否定、绝望的深渊,等待彼岸那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一种超越自身之外的永恒力量。因此,虽处于一个绝望分裂的堕落世界,虽要面对来自历史的和自身的罪行、命运的蹂躏和上帝的筹划,现代诗人并未放弃救赎的可能性。也可以说,现代自我的分裂、破碎和否定恰恰也是对神的大我、完整和统一性的诉求。例如主题最明确、结构最完整的宗教诗《隐现》(1947):

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
忽然转身,看见你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
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
请你糅合,
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①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大公报》,1947-3-30(星期文艺)。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隐现》回响着艾略特的《荒原》、《空心人》、《小老头》等诗歌的相似主题：作为一个悔改的罪人，诗人既在“我们”之中，又在“我们”之外，他一方面毫不隐藏地揭露每个人的种种罪行与错误，另一方面又毫不迟疑地舍弃顽固骄傲的“自我”，将自己的生命与“主”重合，带领我们聆听生命之源。如同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燕卜荪一样，穆旦笔下分裂的“我”、堕落的“我们”显出了从自我破碎、挣扎到自我拯救、皈依的历程，在它们的控诉、反思、悔改、呼吁、祈祷中，逐渐转向了无所不在的“上帝”。虽然“上帝”、“主”以及与此相关的“你”、“他”等称呼，“糅合”、“合一”、“结合”、“融(溶)和”、“整合”、“皈依”等词汇在《隐现》及其他诗中反复出现，但穆旦心中的上帝并不吻合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虽然他表面上也认可安排世间一切的万物创造者和支配者的上帝，认为宗教信仰为人的生存提供了终极价值和心灵安慰，但更多时候他对这个隐匿沉默的操控人类命运的上帝充满着质疑与诘问。虽然上帝的“隐匿”与“不在场”使得诗人的寻求与呼告成为可能，但对上帝的怀疑与惶惑、控诉与责问并不见少。有时破碎的自我不仅没有得到拯救，反而陷入更深刻的危机与深渊之中。矛盾、分裂、破碎、被囚禁的个体之生存困境在上帝的计划中变成了“一个真理”：

> 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
> 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
>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 你给了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
> ——《出发》(1942)

在《约伯记》中，约伯“对善良的人为什么有苦难”这一问题进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行了尖锐的质疑，穆旦也以约伯式的质疑与皈依来承担个体生存过程中无法理喻的苦难和"丰富的痛苦"。"在《约伯记》的影响和启示下，穆旦以神性的眼光来看待个体生命在社会历史境域中遭遇到的痛苦与混乱，使之变成了信仰领域中的真理，从而超越了现代启蒙思想的桎梏，超越了同时代人，为个体生命拓展出了一片全新的生存空间。"[①]无疑，这是穆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贡献。在一个中国现代社会发生剧烈转型的骚动时代，穆旦对人之苦难与痛苦的揭示、对神性的叩问和追寻为中国新诗的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考深度和广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穆旦毕竟不同于真正的坚定信仰者约伯，在经受了各种苦难的考验和内心的质疑后，依旧毫不动摇地信靠上帝。穆旦只是在某种理念上、思考上以及诗歌的表达形式上认可上帝的存在，而非在实际信仰中体现上帝的救赎与信仰的根基。在《蛇的诱惑》、《神魔之争》、《忆》等诗歌中，我们读到的是个体自我与神性非我、傲慢与谦卑、愤怒与忏悔、斥责与怜悯、魔与神、否定与否定之后的肯定等两种对立话语的彼此交织、争执与呼应，它们呈现了穆旦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内在矛盾：对上帝的怀疑更多于对上帝的信靠。在某种意义上，穆旦诗歌中圣经话语的复杂性与含混性也呈现了现代中国人走向基督教信仰之路的艰难与挣扎。

从现代主义艺术视角而言，现代自我的分裂冲突、否定弃绝也指向了最终的平衡、和解与统一的方向。穆旦诗歌从精神上说，处于孤独和异化状态的个体渴望着与自己隔离的对象（神、创造者、原初的根、伊甸园、天、永恒）重新"融合"，从而达到某种程度的妥协、宁静与平衡；从形式上说，整齐划一的诗行、前后呼应的结构、充满张力的对比、紧张的情绪，最终要统一到精致有序的结构中。这充分体现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特质："诗是许多不同张

① 蒋永影："穆旦与基督教文学"，见《名作欣赏》2010年第2期，第104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力的最终消除和溶解所得的模式。文字的正面暗面的意义，积极作用的意象结构，节奏音韵的起伏交错，情思景物的撼荡渗透都如一出戏剧中相反相成的种种因素，在最后一刹那求得和谐。"① 上帝无所不在的秩序与和谐亦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彰显在穆旦诗歌的艺术结构中。

四、魂归何处：中国现代文学的灵性写作

毫无疑问，圣经为穆旦的写作提供了不同于中国古典时代的精神资源和现代视角。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先生把穆旦视为"中国人中受圣经遗产影响最深刻的一位哲学诗人"，"跟其他大多数把圣经当作'活水的源泉'之人一样，穆旦并不是一个基督信奉者。对他而言，圣经及其故事、教义是值得赞美的事物，其中的文学性、美学性和道德性价值不仅对整个犹太教与基督教世界，而且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种补充。"②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同时也要看到不同于艾略特、奥登、里尔克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现代诗人最终走出小我、走向十字架的确信，与穆旦类似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认可、接纳或利用更多时候停留在观察世界的方式、文学主题或象征风格等方面，容易以经世致用的现实态度和传统认知方式面对信仰问题。这也就不难理解，穆旦的精神皈依并非出自内在真实的信仰，而只是在文化视野和叙述策略上接受了一些基督教教义、神学话语与现代主义模式，在思想情感上认可某种形而上的超验精神，藉此来批判现实的残缺，反思人性之罪。其骨子里依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

① 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见《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66页。

② 马利安·高利克："《圣经》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从周作人到海子"，李燕译，《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1卷第2期，第121，118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的统摄，终究是老庄式的“逍遥”而非基督教的“拯救”。按照穆旦同学、批评家王佐良的说法：穆旦“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上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①]这也就不难理解，穆旦的救赎之路仍是传统道家式的回归人类的童年与赤子状态：“我要回去，回到我已迷失的故乡”，“孩子，我要沿着你们望出的方向退回。”（《阻滞的路》，1942）作为中华民族及其未来的代言人，“我”最终要成为人民的歌手、光明的使者：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们啊，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赞美》（1941）

显然，不同于艾略特、里尔克、奥登式的西方现代主义，穆旦式的中国现代主义依然掺杂了浪漫主义的精英理想、现实主义的务实精神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爱国情怀，表达的完全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痛苦挣扎和不屈信念，而非在宗教信仰上对彼岸世界的真正叩问。然而，即便是这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文学现代感，这个分裂、矛盾、探索的“小我”也很快被无声无息地淹没在民

①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见《穆旦诗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121页。有关穆旦与基督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王毅“围困与突围——关于穆旦诗歌的文化阐释”（《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段从学“从〈出发〉看穆旦诗歌的宗教意识”（《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张少青“穆旦诗歌与基督教精神的契合与分离”（《文教资料》2010年6月号下旬刊）等。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族的大合唱或时代的集体洪流中。自1949年之后，在历史整体化和意识形态统一性的整饬下，穆旦式的源自现代个体的现代性表达和信仰诉求被视为不合时宜；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了悲剧性的命运。1953年，留学美国的穆旦甘愿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一心报效他挚爱的土地和民族。1958年12月，因曾经参加过缅甸远征军的一段历史和南开大学的"反右倾运动"，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逐出讲堂，接受机关管制三年。在"文革"期间，他又首当其冲地被批斗、抄家，进入"牛棚"改造。即便如此，二十多年来，这个被压抑的不屈不挠的自我依然通过翻译雪莱、拜伦、普希金、叶芝、艾略特、奥登的诗歌，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倾诉着无法写作的痛苦和灵魂的苦苦叩问。①穆旦写于1975—1977年后期的为数不多的诗歌多以"我"为出发点，感叹时运的残酷、爱情的失落、前途的迷惘、时光和季节的流逝、生命的痛楚、死亡的冥思等，显得更加率真和悲怆，是一个受难者发出切身之痛的肺腑之语。《智慧之歌》(1976)是诗人对青春的爱情、喧腾的友谊、迷人的理想的自我叩问与自我否决："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色彩留在这片荒原？"如同被放逐的屈原，穆旦对曾经依托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发出了质疑与拷问：

我冲出黑暗，走向光明的长廊，
而不知长廊的尽头仍是黑暗；
我曾诅咒黑暗，歌颂它的一线光，
但现在，黑暗却受到光明的礼赞：

① 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见《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其中提到："前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在他们的创作受到冲击的艰难时期，都曾转向翻译。对穆旦而言，他还必须转得更为彻底，因为在那个年代，他已渐渐没有了别的选择。对他来说，从事翻译甚至具有了幸存的意义。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心呵，你可要追求天堂？

——《问》(1976)

但穆旦式的拷问仅仅停留在一种郁闷心情的抒发和对黑暗的控诉上，却无法深究罪恶、黑暗的源头，仍缺乏对苦难的反思和承担，更谈不上来自灵魂的忏悔与救赎，其水准甚至未及四十年代的深刻与透彻，虽然这与此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穆旦的不幸早逝有关，由此也可以看出信仰的缺失带来灵魂的迷惘与无助，尤其是在一个诗人被长期禁锢的沉默时代。对比一下，即便是在前苏联那高度集权的制度下，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依然涌现了令世人骄傲的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等伟大作家。如1970年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在斯大林极权统治时期曾因"自由思想"被捕入狱八年，甚至被开除出苏联作协，驱逐出境，他依然通过《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等作品揭露极权意识形态和统治对个人精神自由和生命尊严的摧残，深刻反思社会之病、时代之疾与人性之罪，通过信仰的发现和自我的承担与忏悔，来救赎堕落的灵魂："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她怎样参与了欺骗。必须从此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不是我宽宏大量，人们自己不应该原谅自己。我在作品中作了许多悔过。进行宽恕的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①]如此一种以忏悔意识为根基的信仰情怀承接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俄罗斯文学的精神谱系。

与同时代一些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相异的是，由于时代语境、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以穆旦一代为代表的无数受难的

① 齐宏伟：《从〈忏悔录〉到〈复活〉——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小我"心甘情愿地跳入轰轰烈烈之"大我"的历史洪流中，最终无法逃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虽然穆旦为中国新诗切入了一个神学的维度，在思考人性、自我与人类历史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话语和表达方式。但站在我们的时代，应当看到他只是以个体体验、自我独白的方式思考上帝，呼唤皈依，却没有在精神与灵魂的深度与上帝相遇、展开信仰上的"我—你"对话。这种知识、理性意义上的信仰诉求并不能带来生命的真正转化，脱胎换骨。现代神学家舍斯托夫认为知识并没有把人引向自由却反而使人奴化，知识所提供的理性被人类的苦难征服了，因此"通向生活的原则、源泉和根本途径是通过人们向创世主呼吁时的眼泪，而不是通过那询问'现存'事物的理性"。①穆旦以基督教信仰为诉求的现代性写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兆示了无法彻底提升到耶路撒冷精神的写作困境。

文学不是神学的传声筒，但如果文学没有神学的根基和对人类终极精神价值的关怀，那种属世的文学往往缺乏自我灵魂的拷问与自上而下的透悟，其美学价值亦值得怀疑。正如艾略特强调的："我们把文学判断和宗教判断分离得多么完全而又多么不合理，这一事实我相信是我们还没有认识的。假如这两桩东西能够分离，那倒也许不要紧；但是这种分离是不完全的，而且永远不能够完全的。"②在艾略特看来，断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伟大性"，只用文学标准是不够的，而应与道德和宗教标准结合起来："文学批评应该用从一个明确的伦理和神学立场出发的批评，来使它完善。"③长期以来，中国作家始终缺乏透视苦难和承载苦难的精神

① （俄）舍斯托夫：《舍斯托夫集》，方珊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491页。

② 艾略特："文学与宗教"，见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30页。

③ 艾略特："文学与宗教"，第127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力量。齐宏伟认为:"尤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很多作家如许地山、冰心、林语堂和老舍等都走近乃至受洗加入了基督教,但基督教灵性文学最终没有能形成气候,百年中国文学走的还是一条'忧世'而非'安魂'之路。中国作家对基督教的接受和理解大都带有'为我所用'的偏见,致使他们未能真正进入基督教精神资源深处。"①当代中国文学一方面被各种意识形态话语所捆绑,另一方面被喧哗的时代环境、市场经济所蛊惑,文学并未获得其自由的存在权和发言权,作家们往往陷入"下半身写作"的身体欲望的宣泄或"美女写作"之类的哗众取宠,而少见那种为个体受难的肉身而言说,为现实的痛楚而呐喊的具有精神深度的作品。虽然我们能够在北岛、海子、史铁生、北村、廖亦武、岛子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中较多地感受到对苦难的质询、个体的叩问以及信仰的诉求,但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刘小枫认为如果不把雅典和耶路撒冷精神"据为己有",汉语言词不可能返回肉身,汉语文学也不可能进入实存的在世:"从存在的根性,从人的处身性而非仅只是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性来审视个人的困境,更确切地讲,从个人与末世论的关系的根本立场进入个人的生存困境。"②与此相应,华文女作家施玮也在极力呼唤开拓汉语文学神性空间的"灵性文学":"灵性文学正是要给予阅读者一双灵性的眼睛,让人看见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让人从扭曲、污损的生命中看见人里面'神'的形象,看见人原初当有的尊严与荣美。"③对于今天的中国作家而言,我们如何承接穆旦式的源于生存困境而呼唤神性的精神遗产?如何恢复为个体肉

① 齐宏伟:"'灵性文学'与'灵性写作'的若干思考",见杨剑龙编《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第38页。

② 刘小枫:"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的景观转换",见《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香港:卓越书楼,1993年,第109页。

③ 施玮:《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见杨剑龙编《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第30页。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身而言说的五四文学传统？如何通过诗意的呈现，用源自神的灵性光照尘世、救赎罪人？无疑，穆旦一代的写作困境和人生悲剧可以成为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文学何去何从的出发点。

作者刘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教授。工作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院，主要研究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和女性文学，近著有《艾略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现代批评之始：T. S. 艾略特诗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尤利西斯〉：叙述中的时空形式》（北京：文津出版社，2010）。

© 1994-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